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从
书
Wuhan University

李建中 李小兰 著

批评文体论纲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WUHAN UNIVERSITY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从 书

李建中 李小兰 著

批 评 文 体 论 纲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文体论纲/李建中,李小兰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2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11996-3

I . 批… II . ①李… ②李… III .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评论—文体论 IV .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055 号

责任编辑:胡程立 陈 翩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21.5 字数:303 千字 插页:3

版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996-3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论 尊体·破体·原体：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	1
一、尊体：重建批评文体意识.....	2
二、破体：重识批评史嬗变规律.....	6
三、原体：重塑“體”之生命和风骨	10
 第一章 批评文体研究的西学背景	16
第一节 向内转：迟到的影响	17
一、内—外—内：中国文论的两次转换	17
二、外—内—外：西方文论的两次转换	20
三、内外之间：影响与焦虑	23
第二节 文体与语言	26
一、语言表达激活思想	27
二、文学是语言表达的完美形式	32
三、语言突出及其诗性功能	36
第三节 文体与文体学	40
一、文体学的价值	42

二、文体学的方法	46
三、文体学与修辞学	50
第二章 批评文体意识的理论形态	56
第一节 宗经以尊体	57
一、体乎经	58
二、文能宗经，体有六义	61
三、圈别区分与总其归途	64
第二节 贵文以尊体	68
一、文之为德也大矣	69
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71
三、循体而成势	74
第三节 爱美以尊体	78
一、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	78
二、清词丽句必为邻	82
三、南威之容论于淑媛	85
第三章 批评文体呈现的古典样式	91
第一节 《庄子》：将说什么化为怎么说	91
一、庄子说什么	92
二、庄子怎么说	96
三、安得夫忘言之人与之言哉	100
第二节 《文心雕龙》：用怎么说征服说什么	104
一、骈体论文	105
二、比兴释名	108
三、秀隐彰义	112
第三节 《二十四诗品》：最好的怎么说就是说什么	115
一、各以韵语体貌之	116
二、诗眼：韵外之致	122
三、画境：立象以尽意	125

第四章 批评文体生成的历史语境	132
第一节 文学观念变迁与批评文体生成	133
一、泛文学观念下的文体寄生	133
二、文学独立进程中的文体借用	137
三、纯文学观念下的文体独立	140
第二节 学术的多样形态与批评的文备众体	143
一、子学与对话体	144
二、史学与实录体	147
三、经学与传注体	151
四、玄学与隐喻体	153
第三节 批评功能与文体功能	157
一、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	158
二、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	161
三、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	164
第五章 批评文体生成的文学性因缘	169
第一节 一“体”二用	170
一、文学文体的批评功能	171
二、批评思想的诗性言说	181
第二节 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	187
一、论家原本是诗人	188
二、五经皆含文也	191
第三节 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	194
一、赋者，铺也	194
二、二马相并曰骈	198
三、诗缘情与诗明理	205
第六章 批评文体嬗变的形式规律	210
第一节 体制：有常与无方	211
一、禅让：变文之数无方	211
二、承续：设文之体有常	215

三、无方与有常的悖立整合	231
第二节 语体：相递与同体	233
一、散韵相递	234
二、隐秀同体	238
第三节 体貌：时序与通变	243
一、质文代变	244
二、雅俗相嬗	249
 第七章 批评文体嬗变的赓续与新创	256
第一节 文辞宜以体制为先	257
一、诗话体：风的姿态	257
二、序跋体：长怀叙志	263
三、传记体：文史一家	268
第二节 天地间竟有此等文字	275
一、学术美文	276
二、深于取象	280
三、灵魂奇遇	284
第三节 游于艺	289
一、美学散步	289
二、抽象抒情	295
 结 语 文体学研究的路径与前景	301
一、文体学研究的三条路径	302
二、追溯文体学的理论谱系	307
三、建构文体学的本体论价值	313
 参考书目	319
后 记	331

导 论

尊体·破体·原体： 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近 30 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其基本思路可表述为：如何在融通中西、打通古今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失语”焦虑引发的“现代转换”诉求，无论学界中人对此持何种态度，它事实上已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中心话题。^① “失语”焦虑从何而来？缘于古代文论的“说什么”（言说内容）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部分失效；而文论界的“失语”焦虑和“转型”诉求，又引发对古代文论“说什么”的过分关注并将其视为实现现代转换的唯一支点。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古代文论现代转型至今未见实质性成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古代文论“说什么”的过度研究导致对“怎么说”（言说方式即批评文体）的有意忽略，从而造成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困

^①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请参看蒋述卓等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7—151 页。

难。而本书的研究，正是要从批评文体的角度切入，重建“尊体”传统，重识“破体”规律，重塑“體”之生命尊严感和个体独创性，以此重开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路和诗径。

一、尊体：重建批评文体意识

“尊体”一词，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专有术语，其义有广、狭之别：狭义的“尊体”，特指古代词学理论对词体之本色的执著；广义的“尊体”，则泛指古代文论对文体（体制、语体和体貌）的尊重和推崇。本课题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尊体”一词。

中国古代文论自身有着悠久的“尊体”传统，最迟至魏晋南北朝文体意识已臻成熟，曹丕、陆机、挚虞、萧统、刘勰等文论大家均有“辨体”之理论书写和“尊体”之批评意识，尤其是在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体”占有重要的地位：“论文叙笔”（文体论）的尊体自不待言；“割情析采”（创作论）之标举体性、风骨，“崇替于时序”（文学史论）之臧否体貌、篇体，“怊怅于知音”（鉴赏批评论）之首观位体等，均为尊体之明证；而“文之枢纽”（总论）之“师乎圣，体乎经”，^①更是明示“经典乃文体楷模，圣人乃文章师表”的尊体意识。

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既不同于汉代经学家的独尊儒术，亦有别于唐宋古文家的文以明（载）道。如果说，在《序志》篇里，刘勰的尊奉儒家之道尚有实质性内涵，比如借用两个梦明示其“随仲尼而南行”的人生理想和“敷赞圣旨”的文化诉求；但是在总论的前三篇中，刘勰的尊孔儒之道则多为表面文章，诸如“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原道》篇）、“妙极生知，睿哲惟宰”（《征圣》篇）、“三极彝道，训深稽古”（《宗经》篇）等等，多是一些套话或空话，既缺乏儒家文化的实际内涵，与《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亦无甚关联。但刘勰又确乎是儒家圣人的虔诚的追随者，确

^① 以上引文均出自《文心雕龙·序志》，见（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下册第726—727页。本书凡引《文心雕龙》，皆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恕不另注。

乎是儒家经典的睿智的解读人。只是刘勰的“虔诚”和“睿智”，并未投向儒家圣人和经典的伦常之理，而是投向其文体之道。《宗经》篇在追问后经典时代文学创作“流弊不还”的原因时指出：“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对于圣人及经典而言，“励德树声”是理，是言说内容，“建言修辞”是体，是言说方式。后经典时代的文学家，只知道在“理”的层面师圣，却不能够在“体”的层面宗经。因此，刘勰“正末归本”，必得在“体”的领域内师乎圣、体乎经。在文学理论家刘勰的眼中，儒家圣人和经典的价值之所在，主要的不是人伦之理而是典诰之体。

细绎《征圣》、《宗经》二篇，不难发现刘勰所看重的并非是圣人和经典的“说什么”，而是圣人和经典的“怎么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征圣》篇论“事迹贵文”时举了两个《左传》中的例子：一个是郑子产的“以文辞为功”，一个是宋平公的“以多文举礼”。这两个人后来之所以得到孔子的称赞，是因为他们的“文辞”和“多文”，是因为他们在规定的语境中找到最好的最有效的说话方式。《征圣》篇进一步指出，儒家的五经之所以可尊可贵，也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独具魅力和价值的言说方式：比如《春秋》的“一字以褒贬”，《礼记》的“举重以包轻”，《诗经》的“联章以积句”，《尚书》的“体要以成辞”，《周易》的“断决”和“昭晰”。五经的“怎么说”成为后世楷模，故《宗经》篇将后经典时代各种文体的源头追溯至五经：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刘勰一口气排比了二十种文体，几乎预叙了后面“论文叙笔”的全部。各类文体的源头和根本在五经，各类文体的表率和疆域也在五经。刘勰用尊体的眼光征圣、宗经，亦用尊体的眼光正纬、辨骚：《正纬》篇认为纬书之伪在于“先纬后经，体乖织综”；《辨

骚》篇则指出骚之同乎经者是因其“体宪于三代”，有“典诰之体也”。

征圣宗经的刘勰，在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时，视先秦儒家元典为最宝贵的文化和文论传统；但刘勰对这一传统的承续并非是不加辨析地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变通，有所取舍：对儒家元典的“说什么”（人伦之理），刘勰通常是大而化之甚至语焉不详；对儒家元典的“怎么说”（典诰之体），刘勰却有着广泛的探讨和深入的论述。刘勰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针砭“文体解散”之弊端，担负“正末归本”之使命，实现“文心雕龙”之伟业。一句话，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为了理论建构的需要。刘勰对待传统和经典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古代文论作为我们的传统，大体上有两个部分：言说内容与言说方式。中国文论传统形态的“说什么”，部分内容因其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在今天已失去了作用和价值，或衍为空泛（如“文以载道”），或成为常识（如“物感心动”），或无处可用（如“四声八病”），或无话可说（如“章表书记”）……而中国文论传统形态的“怎么说”，一些基本的言说及思维方式却独具超时空的生命力，如批评文体的文学化，话语方式的诗意图，语体风格的审美感，范畴构成的经验归纳性质，思维方式的直觉、象喻、类比、和合、折中……我们今天要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最先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根据现实的需要清理传统并决定对于传统的甄别和取舍。公元6世纪的刘勰，对待他的传统（儒家元典）是重其“怎么说”而轻其“说什么”；公元21世纪的我们这些刘勰的同道，对待我们的传统（古代文论）也应该是重其“怎么说”而轻其“说什么”。

我们这样做当然不是简单地模仿刘勰，个中缘由除了上述之现实需要，还有厚重的历史内涵。中国古代文化和文论的经典性文本，其“怎么说”常常起着张扬、突现乃至征服、融合“说什么”的重要作用，以至于最终将“说什么”化为了“怎么说”。以《庄子》为例。《庄子》想说什么？说“道”。但老子已说过“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就不是“道”。老子还说过“道”是没有味道、形状、声音和名字，叫无、大、太、有，叫什么都可以。作

为老子的继承人，庄子也知道“道”不可言说，他在很多寓言中都说过，语言是糟粕，言不尽意。因此在庄子看来，“道”是不可说的，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说什么也无济于“道”。于是对庄子来说，“说什么”变得不重要，那么“怎么说”就变得非常重要；既然所要言说的都体现在“怎么说”上面，所以他全部的智慧都用于“怎么说”。《庄子》专门有《寓言》篇，后来研究者认为这是《庄子》的凡例，它告诉了我们庄子是“怎么说”的。而《庄子》之所以成为先秦诸子中是最有魅力的一部奇书，就是因为庄子找到了一种最佳的说话方式，《庄子》的成功在于他把很难说甚至不可说的东西（“说什么”）变成了奇崛而瑰丽的“怎么说”，从而把说不清楚的“道”不仅说清楚了，而且说得汪洋恣肆，说得环玮联翩。一言以蔽之，《庄子》的成功，是“怎么说”的成功，其“怎么说”就是“说什么”。

受《庄子》“怎么说”的影响，中国文论历朝历代的批评文体都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魅力：既看重文体又不拘一体，也就是将“尊体”和“破体”结合起来。比如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言说，曹丕用论述体，曹植用书信体，陆机用赋体，钟嵘用诗话体，萧统用选体，刘勰用骈体……究其实质，都是要为自己的“说什么”寻觅一种最佳的、最有效的“怎么说”，从而实现“怎么说”与“说什么”的完美统一。而在这方面，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一个典范。《二十四诗品》想说什么？说诗歌的二十四种风格和意境；《二十四诗品》怎么说？用诗歌的语言、风格和意境。没有任何的论证，不加任何的判断，纯粹让读者在对二十四首诗歌的审美享受中，感知和体悟诗歌的不同意境和风格。在这里，“说什么”与“怎么说”统一了，“说什么”完全消融在“怎么说”之中。《二十四诗品》其实是纯粹的诗歌，完全可以将其当做山水诗、抒情诗来读，但在《雄浑》、《冲淡》这样的标题指引下，我们才知道作者要告诉读者的，并非他所描摹的景物或渲染的气氛，而是借此来归纳中国古典诗歌的二十四种意境。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高妙境界：“怎么说”消融了“说什么”。还有，诗歌这种文体讲究语言精炼，讲究称名迩见义远。司空图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说《典雅》，用“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说《含蓄》，^①说出来就是唯一，就是永恒，就是钟嵘所说的“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②

二、破体：重识批评史嬗变规律

从整体上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见其“尊体”传统；而依次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在历朝历代的嬗变，则可见其“破体”规律。所谓“破体”又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刘勰说“设文之体有常”，特定的言说内容须安放于相应的言说方式（体裁、语体、风格等）之中，但古往今来的中国文论家却“破”这个“常”，有意无意地将理论内容安放于文学文体，此其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批评文体，此一时代之新文体是对彼一时代之旧文体的“破”，此其二。同为“破体”，前者为共时性，后者为历时性，二者整体性地塑造着中国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品质。

追根溯源，批评文体的文学性品质同样本于先秦经典。《文心雕龙·宗经》篇：“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不仅是“五经含文”，先秦的诸多文化典籍，其言说方式或多或少都是“含文”即包含有文学性的。抒情言志的《诗经》、《楚辞》自不待言，记言记事的《尚书》、《春秋》、《左传》以及纵论天下道术的周秦诸子，均有各自的文学性言说。《文心雕龙》对周秦典籍的文学性特征有着细致的描述，如《情采》篇说《老子》是“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子》是“辩雕万物”是“藻饰”，《韩非子》是“艳乎辩说”是“绮丽”。又如《征圣》篇说《礼记》“简言以达旨”，《诗经》“博文以该情”，《周易》“明理以立体”，《春秋》“隐义以藏用”……《征圣》称包括《诗》、《书》、《易》、《礼》、《春秋》在内的先秦典籍为“圣人之文章”，而“圣文之雅

^① （唐）司空图著，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1页。

^② （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雅丽”、“衔华佩实”是刘勰对先秦圣文之文学性的总体概括，所谓“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宗经》篇更是对先秦经典的文学性作出“敷理举统”式的论述：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从情采到风骨，从事义到体性，从文辞到声律，圣人文章的文学性无所不在。后人摛文裁章必定尊奉圣人的典诰之体；而尊体之要务，则是从圣人的文章中吸纳文学性精华。刘勰将典诰之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富诗意图地表述为“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泰山遍雨，河润千里”。这里的“心”是“文心”，这里的“雨”是文学性甘露。

因为“五经含文”，故“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刘勰尊体，看重的是典诰之体的“文”；刘勰破体，看重的是文学理论及批评的文学性言说。不惟刘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诸多的批评家都具备此种批评意识。因此，“破体”作为批评史的嬗变规律，其共时性特征是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其历时性特征则是在承继文学性语体和体貌的大前提下变革其体制。共时性的“破”，是“破”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言说；历时性的“破”，则是“破”出批评文体的时代风貌，或者说使批评文体的文学性言说适应特定时代的需求。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先秦文论没有自己的批评文体，其文学批评只能以片语只言的方式寄生于经、史、子、集：如“诗言志”寄生于《尚书》之《尧典》，“季札观乐”记载于《左传》之襄公二十九年，原始儒、道的文艺思想散见于语、孟、老、庄，匿名的或署名的诗人的文学思想吟咏于风、骚……由于上述经、史、子、集本身就不同程度地具有文学性特征，故寄身其中的先秦文论先天性地禀有文学性气

质，并将这一气质遗传给后世批评文体。汉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诗经》和《楚辞》，故汉代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是《诗大序》和《楚辞章句序》。相对于先秦文论的寄生体，汉代的序传体是一种“破”。应该说，到了汉代，古代文论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这是“破”的功劳。汉代批评文体对于前代既有“破”（新变）亦有“通”（承续），后者如司马迁、班固的文学思想寄生于史书，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人的文学思想寄生于子书。

魏晋南北朝文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巅峰，其标志性高度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就其批评文体而论，此高度可谓空前绝后：用骈体文书写文学理论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仅此一例！刘勰有自觉而成熟的文体意识，他清楚地知道文与笔异区，诗与论别囿，可是他自觉而成熟地选择了用骈文这一纯粹的文学文体来讨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这就是“破”。刘勰之“破体”，破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伟大而悠久的传统：诗性言说。体制（体裁）的文学性，体式（语体）的隐喻性，体貌（风格）的审美性，三者共同构成《文心雕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诗性言说的文体特征。六朝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陆机《文赋》是标准的文学体制；曹丕《与吴质书》和曹植《与杨德祖书》以情动人，形成独特的美学风貌；钟嵘《诗品》，其“序”才气高妙、文辞劲健，其品评文字多隐喻和意象，亦形成明显的文学性体式。

唐宋批评文体，其体式及体貌的文学性与六朝文论一脉相承，其体制则是用诗体和诗话体“破”六朝的骈体和赋体。六朝重骈俪，三唐重诗，这也是时代风习使然。《诗经》篇什中已有“以诗论诗”的诗句，但那只是一首诗中的片断；而唐宋金元则有了专门的论诗诗，李白、杜甫、韩愈、苏轼、陆游、元好问这些大诗人皆写有论诗诗。此外，宋代盛行的诗话体也是前代鲜见的。诗体抒情，诗话体叙事，故论诗诗是在抒情中言理，诗话是在叙事中明道。明清文论的破体与此时期文学的破体直接相关。明清文学，诗不如盛唐，文不如先秦，而能够破诗文之正宗且独树一帜的只有小说和戏曲。与之相适应，明清文学批评以评点体破前代的诗话体。

诗话体从动笔到杀青都是独立成篇，而评点体与它所评点的对象原本浑然一体。评点体的文字一旦从原作中被切割出来（今人常常这样做），便因其失却上下文和语境而失却原有的文学性意蕴和美学魅力。比如明清水浒评点，李贽的评点文字须放回到一百回的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金圣叹的评点文字则须放回到七十回的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才可以真正达到卓吾先生所喟叹的效果：“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① 这是评点体显示其文学性的独特方式，也是评点体对前代各种批评文体的“破”。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论的批评文体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外，是欧、美、日、俄式的文体和语体，承载着西方强势文化破门而入；在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白话代文言，彻底改变了汉语批评的书写方式。曾在不同的时代各领风骚的序传体、史志体、骈俪体、诗体、诗话体、评点体等，大多成了历史记忆。占主导地位的是符合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的论说体和论著体。从表面上看，这也是时代风习使然的“破”，与前述历朝历代的“破”大体相似。究其实质，近现代批评文体的“破”与古代文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一，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嬗变是在自身的文化语境中发生、运行的，中间虽有佛教的传入，但佛教因其完全被中国化，故对本土批评文体的影响是间接的甚至是微弱的。而近现代西学东渐，本土文化已无招架之力，何谈中国化？文学批评，从观念到方法，从话语到文体，只能别无选择地模拟西方。其二，古代文论的“破体”式嬗变，所“破”的只是体制（体裁），而体式（语体）和体貌（风格）的文学性特征则是一脉相承的。近现代中国文论并没有全面地、整体地了解西方文论^②，只是简单地片面地用现代西方文论的哲学化、科学化言说，

^①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② 西方文论的批评文体也有文学性言说的传统，如柏拉图的对话体和贺拉斯的诗体均为文学性言说。

取代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从而中断了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传统。

三、原体：重塑“體”之生命和风骨

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尊体”传统与“破体”规律，一“尊”一“破”，从字面上看是相悖相斥的；但在深潜层次却有着内在联系。尊体，是对言说方式的看重，是要建立起“怎么说比说什么更为重要”的批评文体意识。而“破体”，则是将尊体意识贯彻于文学批评史的演变历程，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破”出既能满足时代需求又能保持文学性特质的言说方式。尊体，是理论基础，是指导思想；破体，是文体行为，是嬗变规律。二者契合于“体”之原始义：人之“體”（身体、生命之总属）。

说来有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个“体”字，在古代汉语里面读成“笨”，字义也是“笨”，而繁体字的“體”才是真正的“体”：“篆文从骨，豈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體”。如今简化作体，从人本会意。与原本当‘笨’讲的‘体’（bèn），成了同形字。”^①《说文·骨部》：“体，总十二属也。从骨，豈声。”段玉裁注称“十二属”为身体的十二个部分，即顶、面、颐、肩、脊、尻、肱、擘、手、股、胫、足。^②可见“體”的原初释义为人的身体之总称、生命之总属，先秦典籍大多是在“身体、生命”的意义上使用“體”这个字的。如《周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孔颖达疏“体是形质之称”^③，《庄子·天地》“形体保神”成玄英疏“体，质”^④，《孟子·告子上》“体有贵贱”孙奭疏“一身合而言之谓之体”^⑤，等等。人之生命是外显之“形”与内蕴之“质”

^① 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②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③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上册第78页。

^④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册第426页。

^⑤ 宗福邦等主编：《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59页。